

新民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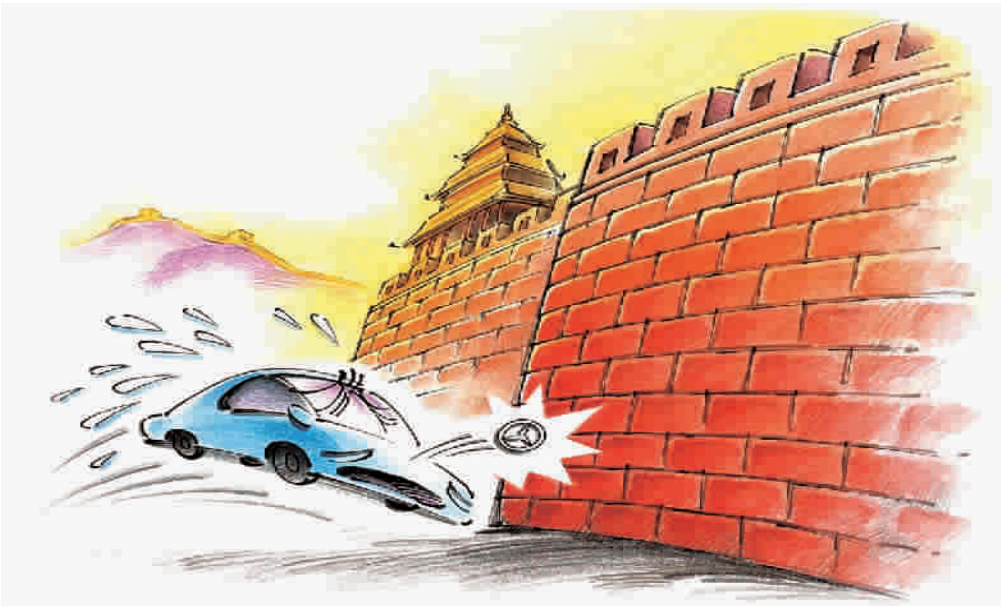
奔驰,“毒舌”可能毀了你

吴健

“当德国汽车经理看到中国市场时,眼眶都会湿润的。”这是该国《焦点》周刊记者塞巴斯蒂安·菲曼去年报道上海车展时的描述,理由是中国市场简直决定着汽车产业的未来。“这里有着什么样的潜能啊!”一位德系车老板这样解释自己的激动。不过,现在有一家德企的经理们,他们的眼眶如果“湿润”了,恐怕因为另一件事了。

2月5日,奔驰品牌的社交账号上发布新车宣传照,偏偏标上来自西藏分裂势力头目的所谓“名言”。奔驰还自作聪明地搭配了刺激性的文案。如此丧失理智和逻辑混乱的广告一露头,立即遭到中国网友和消费者的强烈谴责,奔驰方面第二天就删掉内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此评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知错就改是做人做事最基本的道理,“我们将继续与外国企业合作,也欢迎外国企业继续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当然,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希望外国企业能做到基本的遵循”。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方与外国企业进行全方位合作,互利共赢,并培育出无比珍贵的友谊。菲曼和不少德国车企高管是好朋友:“这个圈子流行一句话,中国不高兴,行业要发抖。”来自德国汽车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2017年中国汽车销量超过2500万辆,2025年则会超过3500万辆,“2025年



孙绍波画

全球市场达到1.06亿辆时,中国的比例将占三分之一”。这其中,梅赛德斯-奔驰公司赚得钱包满满,其高管胡博图斯·特罗斯卡说,去年他们向中国客户交付超60万台新车,创下全球单一市场销量纪录,“这得益于广大客户的信任”。

然而,一边拓展中国业务,一边伤害中国人民,作为奔驰“喉舌”的文宣口弄出上述事端,其心可诛。中国领导人在一次座谈会上强调,要旗帜鲜明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内部事务不容干涉,中华民族大团结不容破

坏!传递的信号如此清晰明确,深耕中国市场多年的梅赛德斯-奔驰岂能不知,明知故犯如此“低级”错误,难道只是偶然?

香港大学客座教授让-皮埃尔·莱曼被不少在华外企高管尊为“文化设计师”,他早就注意到一个不好的现象:西方经济界对中国是如此无知,而且有迹象显示他们还打算维持现状。

“我每年在欧洲和中国之间往返六次以上,在飞机商务舱里,同行的乘客多半是在外企的白人高

管,这些人不是睡觉,就是在看愚蠢的视频或逃避现实的电影,而不是读有关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书,甚至连中国经济方面的书籍也不读。”如果说这种观察尚属感性,那么莱曼为在华外企高管教授课程时的感受就理性得多了,“我通常给新生准备摸底测试,提一些关于中国的很基本的问题,结果总是很糟糕,两位去中国工作的英国高管承认,他们从未听说过让中国跌入苦难深渊的鸦片战争,也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如此敏感”。

曾被美国《纽约时报》派到上海工作的记者傅好文出过一本专著《天下万物:历史如何影响中国力争成为全球强国的努力》,被莱曼推荐给在华外企高管作为“必读”。傅好文提出了重要论点:在当前时代,西方人不仅必须熟知中国历史,还要熟知中国的历史观。过去两个世纪里,西方的历史观居于统治地位,这种历史观是偏狭和有选择性的,由于世界正迈入“中国日益走向舞台中央”的时代,傅好文的先见之明就显得非常重要。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罗斯金所言,历史在当前的政治中是鲜活和可取的,它形成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乃至文化。中国经历百年苦难,在西方列强侵略蹂躏、瓜分豆剖之下重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其间的历史已然成为一种民族记忆,成为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对这一点的不敬与怠慢,是不能原谅和错误的。

德国记者芬恩·迈尔-库克(音)曾给本国车企的一个忠告,不止是技术问题或者恶劣的顾客服务会招来中国社会巨大的抗议浪潮和“狗屎风暴”,政治、历史和文化方面的“踩雷”同样会导致难以收拾的局面。

具体到奔驰,小心让“毒舌”毀了你,要知道中国人和德国人有个显而易见的相同点——对国家分裂行为绝不饶恕,德国有《基本法》第37条,中国有《反分裂国家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东方图书馆:曾是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

周恩来在此亲自指挥武装起义



上海市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旧址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专家
点评

首次大胆尝试
夺取中心城市

东方图书馆被誉为东方“文化宝库”。这是上海一处重要的红色遗迹,记载着大革命时期我党独立领导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辉煌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夺取中心城市的第一次大胆尝试。起义共消灭3000多名北洋军和2000多名武装警察,收缴枪支5000多支。起义胜利后,上海各界代表举行市民代表会议,成立上海市民政府。1977年,该旧址被列为革命纪念地。198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旧址”纪念碑揭幕典礼在此举行,成为永远的红色遗迹。

徐光寿(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东方图书馆被拿下后,迅速成为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周恩来坐镇指挥了总攻北火车站的战斗。起义胜利后,还选举产生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首、联合各阶级各阶层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机关——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民政府。

炮火炸毀“文化宝库”

资料记载,东方图书馆是一座钢筋混凝土五层大厦,占地约3亩半,始建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资建造。1926年5月3日起对外开放,年均进馆阅览人数达3万人。茅盾等许多著名人士都曾在此汲取文化养分,暗中为党工作。

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中,300多名工人和群众为寻求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而牺牲。起义队伍中还有一支大军是由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人组成。周恩来指挥攻打东方图书馆和北火车站的两场战斗成为革命佳话,工人运动留下的宝贵经验与精神财富也将永载史册。

在1932年爆发淞沪抗战中,这座东方“文化宝库”毁于日寇的炮火下。东方图书馆创办人张元济的孙子张人凤曾撰文写道,“一批跟着张先生做古籍整理、校勘工作的年轻编辑,到张家慰问,张元济见到他们,大家抱头痛哭。”东方图书馆中大量珍本古籍,有不少是海内孤本,不可复得,它的损失很难用金钱来衡量。如今,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周武研究员为代表的专家建议,东方图书馆的建筑图纸保存完好,可根据历史原貌复建,这对城市发展历史来说很有意义。

东方图书馆遗址位于宝山路584号市北高级职业中学内,昔日恢弘的建筑今已荡然无存,只剩学校绿地上的一块纪念碑。1927年3月,东方图书馆曾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周恩来亲自坐镇指挥,党史留芳。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图书馆被侵华日军炸毀。

闸北战区最难攻坚

1927年2月19日,在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领导下,上海36万工人高呼“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的口号,举行总同盟罢工。军阀当局派出杀气腾腾的大刀队,白色恐怖瞬间笼罩申城,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武装起义被镇压在血泊中。生死存亡时刻,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召开联席会

议,决定发动第三次起义。会议决定组建由周恩来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作为最高决策机关,此外还设立特别军委,由时任上海区委军事运动委员会书记周恩来负责。

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打响,参战的工人纠察队员有5000多人,周恩来和赵世炎在前线负责指挥。多数地区的战斗很快解决了,独独由直鲁联军盘踞的闸北久攻不下,是“最难啃的骨头”。

敌人以闸北北火车站、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即东方图书馆)、湖州会馆等防御支撑点,负隅顽抗。经过奋战,起义当天,纠察队先后攻下湖州会馆、三个警察署和天通庵

车站,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攻心劝降“围而不打”

号称“远东第一图书馆”的东方图书馆隶属于商务印书馆,收藏中外图书不下46万余册,珍本善本更是数不胜数。当时,东方图书馆是敌人的军需所在地,是总指挥部和北火车站之间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守军虽仅一个排的兵力,但弹药充足,火力强大,又凭借钢筋混凝土建筑,易守难攻。

紧急关头有纠察队员建议,干脆一把火烧掉图书馆,看敌人投不投降。正在火线指挥的周恩来听说此事后,及时赶来制止。他指挥大

家用步枪组成火力网封锁对面敌军的大门,利用附近建筑物包围敌人,改用“围而不打”的办法,同时敌人进行攻心劝降。

上海城市历史研究专家张姚俊曾写道,“21日下午,纠察队把一块绑着劝降书的大石块扔进了楼内。过了半晌,劝降书又被丢了出来。敌人在书信背面回复,要求停战,却只字不提投降之事。双方整整相持了24小时,到22日下午,敌人因外援不至,军心动摇,一部分人企图从后门逃走,被堵在门外的纠察队员抓个正着,余者则打出白旗归降。”东方图书馆终于回到工人纠察队手中。